

凤凰文库·宗教研究系列

ZHONGGUO Tiantaizong Tongshi 中国天台宗通史 (上)

潘桂明 吴忠伟 著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凤凰出版社
PHOENIX PUBLISHING HOUSE

凤凰文库·宗教研究系列

ZHONGGUO Tiantaizong TONGSHI 中国天台宗通史 (上)

潘桂明 吴忠伟 著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凤凰出版社
PHOENIX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天台宗通史 / 潘桂明, 吴忠伟著.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8. 7

(凤凰文库·宗教研究系列)

ISBN 978-7-80643-954-8

I. 中... II. ①潘... ②吴... III. 天台宗—佛教史—中国

IV. B94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9471 号

书 名	中国天台宗通史(上下)
著 者	潘桂明 吴忠伟
责任编辑	王华宝
装帧设计	武 迪 姜 嵩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社(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南京市张王庙 88 号 邮编 210037
开 本	960 mm×1 304 mm 1/32
印 张	24.375 插页 8
字 数	632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43-954-8
定 价	60.00 元(全二册)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鳳凰文庫
PHOENIX LIBRARY

凤凰文库学术委员会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叶秀山 刘 东 江晓原 许纪霖 杜继文
李学勤 李 强 汪 晖 张一兵 张海鹏
陈众议 郭齐勇 洪银兴 钱乘旦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主 任 谭 跃
副主任 陈海燕 吴小平
成 员 刘健屏 黎 雪 张胜勇 王瑞书 吴星飞
顾华明 姜小青 黄小初 顾爱彬 刘 锋
余江涛 吴 迪 吴 源 胡明琇 章祖德

凤凰文库·宗教研究系列

主 编 赖永海 何光沪
项目总监 姜小青 刘健屏 刘 锋
项目执行 王华宝 府建明 孙 峰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作者的话

天台宗是中国佛教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宗派，至今已经有将近一千五百年的历史，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传承不息。在天台宗成立的基础上，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等具有高度思辨和义理色彩的宗派纷纷成立，而在思想领域独具风采的禅宗不久也宣告成立。因此，对天台宗历史和思想的研究显得十分必要。

作为佛教宗派，天台宗不仅形成了独立经营和发展的寺院经济，实施了严格的法嗣制度和寺院规范，确保了以独立寺院为依据的固定地域，而且建立起了体系完整的教义学说。因此，书写佛教天台宗的“通史”，需要就它的历史传承、教理特征、思想演变、外部环境等予以全面阐述，并作出客观的分析评论。从创始人智顗大师起，天台学者就普遍重视理论建设，在完善本宗理论体系的同时，与同时代的学派论师或宗派学者展开论辩，使之在理论体系的规模、哲学思辨的水平方面都有独特的建树，成为所有佛教宗派中最具理论水平的一家。所以，对天台佛教的认识和阐述，除了相关史实的考究和厘清，更有必要就它的宗教义理、哲学思想作出分析研究。本书写作的最大特色，就在于通过对各个历史时期天台学者佛教思想的考察，客观地描

述天台佛教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演变过程,提示天台宗之所以传承久远的奥秘,指出它对佛教思想乃至中国哲学史的重大贡献,同时也剖析它在思维方式、思想理论等方面的若干缺失。

智顗的佛学以止观理论体系展开,这个体系的核心是“一念三千”命题;围绕这个命题,智顗在佛学上既有严格的继承,又有积极的创新。所谓继承,突出表现在禅修实践方面,即以坐禅为核心的程序化严格修行;创新则主要表现在理论体系的完善方面,即以中观学派的般若性空学说为背景,批判同时代的佛教各家思想,结合传统思维习惯和文化趣旨,有效地确立庞大的哲学理论体系。在重点阐述智顗学说体系的同时,本书对宋代初年天台宗内部“山家山外”的思想论争也给予充分关注。在宋初这场旷日持久的论争中,无论是“山家”派的知礼、梵臻、尚贤、本如,还是“山外”派的晤恩、源清、洪敏、庆昭、智圆、仁岳、从义,都以智顗大师的心性理论为出发点,即坚持天台佛学的核心问题进行论辩。直至元明清时代,天台学者的义理辨析仍然围绕着心性主题展开。因此,考察这种心性学说的内容,以及它的深层原因,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

天台佛教的哲学体系和理论框架,包括相似本体论(实相论)、心性论、修养论、解脱论等方面。本书以相关佛学概念、范畴为基础,围绕天台佛教上述论题,重点阐述和评论基本哲学命题,这些命题包括:一心三观、三谛圆融、一念三千、性具实相、性具善恶、无情有性、色具三千、别理随缘、修性一如、理毒性恶,以及无明即法性、修恶即性恶等。通过这些命题的辨析,展现天台佛教学者高于世俗哲学家的理论思维能力,指出天台佛教与其他宗派佛教在致思路向方面的同异,揭示天台佛学(尤其具有本体论色彩的心性学说和止观修养方法论)对程朱理学的实质性影响。

佛教传入之后,中国哲学在思维习惯、理论框架、概念命题等方面都出现重大变化,其中《大乘起信论》的形成起过关键性作用,它不

仅直接影响了佛教“真常唯心论”系统的各个宗派思想,而且也间接影响到儒、道两家思想。佛教般若学向涅槃学的转化,为中古哲学的心性问题讨论提供了契机,通过《起信论》的“一心二门”理论框架,以及心性“本觉”原理,儒、释、道三家之学无不热衷于心性讨论,并以“复性”学说诠释心性“本觉”。智顗的“性具善恶”说,以及由这个命题引申的“无明即法性”命题、湛然的“无情有性”命题,乃至宋明时代一系列心性论命题,充分体现了天台佛学的特色,也反映了中古哲学的特色。天台佛学与唯识学、华严学、禅学等,构成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不可或缺的内容。

天台佛学大大地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内容,为中国哲学从朴素的伦理道德学说向精致的思辨哲学、本体论哲学的转向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料。智顗大师的“一念三千”说是对中国哲学的重大革新,在哲学形态上达到了新的高度。此外,智顗大师的“性具善恶”心性理论,也将传统儒家的人性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宋代天台宗内部的佛学论争,虽然带有经院神学的繁琐色彩,但对学界理论思维能力的提高,尤其对理学思潮心性学说的启示作用,是一个明显不过的事实。遗憾的是,天台佛学对中国哲学的巨大贡献至今仍未引起学界的充分认识,这不利于弘扬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

在当前世界范围的佛学研究领域,一些学者忽视乃至轻视汉传佛典的研究,过分强调对梵文、巴利文原典的依赖,进而采取对中国佛学的否定态度,抨击中国佛教的改革和创新立场,在方法上似乎有值得商榷的余地。诚然,梵文、巴利文原典是佛教资料的重要库藏,可以帮助我们补充和印证相关文献,但它无法取代汉语系佛教原典和资料。受传统文化影响而改变了印度佛学原貌的中国佛学,不仅将佛教的理论和思想发展了,并且在印度佛学消亡之后担当起了中流砥柱的角色。天台佛学的创立和发展,其学说论辩之风的延续和推进,为东方佛教文化宝库增添了丰富的库藏。中国佛学对整个人

类文化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天台佛学在印度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作用乃是历史的定论。

本书是一部完整的天台宗通史,基于天台宗历史演变的特殊性,所以它的重点是天台哲学思想的阐述,尤其是概念、命题的确立以及发展、演变,故也可以名之为“天台思想史”或“天台哲学史”。

受江苏古籍出版社的委托,多年前我们接受《中国天台宗通史》的写作任务,并于2001年正式出版。承蒙出版社的重视,现在又考虑收入《凤凰文库》,以使更多读者了解天台佛学,认识中国古代哲学,我们感到十分欣慰,同时对出版社同仁们的诚意深表感谢。由于我们学识有限,此《通史》必然存在不少缺憾,凡是失误或不足之处,敬请读者诸君批评指正。

导 言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逐渐适应中国社会环境,受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影响而中国化、民族化。魏晋时期,在玄学不同流派思想的作用下,佛教在对经典作理解和诠释时,形成多种不同观点,如讨论般若学的“六家七宗”。这里的“宗”即是“家”,相当于学派,七宗也就是七个学派。南北朝时,印度佛教各派学说基本上都已介绍到了中国,随着佛教学者对佛典研究的逐步深入,转而重视讲述佛典,专攻不同的经论,于是出现许多专通某类经论的经师、论师。各师的观点出自对经论“提章比句”的研究,这些还只是在佛教学派的范围之内,并没有具备宗派的某些基本特点,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形成宗派的客观条件。

南北朝后期的历史进程,已为隋唐佛教宗派的建立准备了条件。陈、隋之际是政治上由南北分裂走向统一的转变时期,天台宗首先在陈、隋之际建立起来。智顗大师创建天台宗的活动是在学派纷争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对南北朝佛教运动的总结,体现了大一统背景下的社会政治需要。天台宗是最早出现的、意义完整的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对照目前学术界公认的佛教宗派形成的基本条件,如形成独立经营和发展的寺院经济,建立完整体系的学说思想,确保相对固定的传教区域,实施严格

的法嗣制度和寺院规范等,天台宗都已经具备。在天台宗确立的基础上,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等具有高度思辨、义理色彩的宗派纷纷成立,而在思想领域独具风格的禅宗不久也宣告形成。天台宗无疑是中国宗派佛教的首创者,而它的理论体系的组织规模、思辨水平也在所有佛教宗派中首屈一指,成为中国佛教宗派的代表。

一

学界对天台宗的学说思想、止观理论体系作出阐述或论辩,迄今已取得若干显著成就,但对天台宗的发展演变作历史性全方位研究、探讨的,则仍然十分欠缺。《中国天台宗通史》作为一种初步尝试,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

第一,天台宗这一宗派佛教,是在中国佛教南北朝后期发展的基础上确立的,是一种历史性的必然结果。

北魏太武帝以不到十年的时间统一北方,并建立起“廓定四表,混一戎华”(《魏书》卷四《世祖太武帝纪》)的异族统治。孝文帝在这一基础上通过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改革,加快了鲜卑族封建化的进程,使北方地区社会经济获得迅速恢复和发展,逐步确立起南北朝对峙中的优势,为北朝最终吞并南朝打下了基础。

南朝自宋武帝至梁武帝,无论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还足以与北朝相抗衡。但南朝并未抓住有利时机北伐,进而统一中国,相反在连年不断的内战以及统治阶级日趋腐败的过程中削弱了自己的力量。534年,北魏分裂(此前六年即528年为“河阴之变”,北魏朝廷内乱,政局已不稳定),这是梁武帝北上进取的良机,但他未能充分利用这一机会。不久,便发生了侯景之乱,梁朝败亡。陈后主叔宝嗣位后,极度荒淫奢侈,南朝的覆灭已指日可待。南北朝政治上的统一已是众望所归的事。

随着南北朝后期佛教事业的迅速成长和佛教理论的不断演进,所谓

“北方重实践,南方重义理”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和弥合,并最终将以实践和义理并重的统一佛教取而代之。就佛教本身而言,它体现为自我认识的深化过程。

北魏在太武帝毁佛前,佛理研究处于初期阶段,禅定修习则比较发达。当道武帝、明元帝相继对佛法表示崇敬时,鸠摩罗什正为后秦姚兴所敬,在长安草堂寺集义学僧八百人译经,宣讲义理。孝文帝远谋深虑,将佛教事业的兴盛与入主中原、巩固统治联系起来,把提倡佛教和推行汉化予以结合。他不仅常命沙门讲解佛经,讨论经义,而且自己“尤精释义”,“手不释卷,顷便为讲”。他的后继者宣武帝也“尤长释氏之义”,常于宫内广集名僧,标明义旨。由他们所倡导的洛阳佛理研习之风,延及北朝后期佛学研究的深入展开。这表明,随着佛教事业的发展,北朝佛教的上层人物已经开始注意到佛理与禅习并重的意义。

与此同时,迟至南朝后期,南方佛教在禅法方面也出现了可观的形势。从梁代起,禅法已在江南广为流行,如《续高僧传》卷二〇《习禅·总论》谓:“逮于梁祖广辟定门,搜扬宇内,有心学者,总集扬都,较量深浅,自为部类。又于钟阳上下,双建定林,使夫息心之侣栖闲综业。”

上述情况表明,南北朝佛教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南北两地都出现了将义理探讨与禅法实践相结合的要求和倾向。这样一种要求和倾向,不仅符合南北朝政治统一的历史趋势,而且也为佛教宗派的产生创造了客观条件。

第二,天台宗的最大特点,是它的止观并重、理论与实践并进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既使它在理论思维方面达到当时哲学思想的最高水平,也使它在佛教实践方面保持平实稳妥的状态。

天台宗的理论体系中,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又有积极的创新。所谓继承,突出表现在修禅实践方面,即以坐禅为核心的程序化严格修行。创新则主要表现在理论思辨体系方面,即以中观学系统的般若性空学说为背景,批判同时代的佛教各家思想学说,结合中国传统思维方法,有效

地确立庞大的新的哲学体系。南北学风的有机结合,理论与实修的紧密联系,使天台宗在早期佛教宗派史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并在千余年的历史过程中顽强地生存下来。

天台宗不废禅观,故与后来的禅宗并不一致。禅宗以禅命名,但普遍放弃禅修;天台宗不以禅为标志,但始终坚持禅修。这不只是修行方法上的差别,也是一种指导思想上的根本不同,故而直接影响到对它们的评价问题。可以认为,天台宗在哲学思辨的水平上不仅远高于世俗哲学,而且也胜出佛教各家学说,在中国哲学史上有十分突出的地位。而禅宗的优势则在它思想上的积极进取,对佛教思想史的无情反省精神,以及对现实社会人生所取的批判态度。天台宗由于坚持止观双修、定慧并重,主张以“一念无明法性心”为原理的个体修行,辅以各类具体的止观方便法门,因而能满足不同层次信仰者的需求。相对而言,禅宗在重建民族自信和提倡思想解放的同时,在修行上放弃循序渐进的方法,导致后来流弊滋生。

第三,天台宗既具有极其高深宏博的哲学理论体系,又不放弃强烈的宗教信仰原则,是密切注意智慧解脱与慈悲济世结合的宗派。

佛教虽然提倡悲智双运,将佛的智慧解脱与菩萨的慈悲精神相统一,但中国佛教宗派后来的发展,则往往沿着两个不同方向展开:或因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转向重智轻悲,或因受特殊社会环境的左右而强调慈悲。天台宗走的是佛教的中庸道路,基本上没有将智慧与慈悲剖为两段。

天台宗的智慧解脱思想,以一念三千、性具实相为核心命题予以表述,其中不乏般若学说的理论论证,也就在这一意义上,它将自宗定义为圆顿之教。至于天台宗的慈悲精神,则是它强烈的宗教信仰的反映,具体落实在忏悔观念、忏法仪规以及净土信仰等方面。

天台宗的忏悔观念、忏法仪规以及净土信仰,对于广大佛教信徒而言,不仅满足了他们对神圣性的仰慕和敬畏,而且也提供了实际修行的

具体步骤。但是,应当指出的是,随着宋以后天台宗对忏悔礼仪和净土念佛的过度重视,必然造成对后世中国佛教发展的消极影响。事实上,在天台佛教的传播过程中,内在地存在着两条路线、两个层面的发展趋势。就向上的一路而言,天台学者在完成止观修行的同时,注重哲学层面的展开,乃至将“众生成佛”推到“无情有性”的极端,并将“性具善恶”学说的争论贯彻始终。就下行的一路而言,则推动了情绪化、简易化的民众信仰和修行,加速了中国佛教平民化、世俗化的进程,从而予近代中国佛教的世俗化运动以巨大影响。以天台佛教为首,在宋代已初步完成各宗与净土念佛的结合,将念佛修行、忏悔程序、道场佛事、礼佛仪式等程式化,并使其在宗教生活中的实际地位不断上升。

天台宗向下一路的信仰活动和宗教行事,与立宗之初的末法观念紧密联系。从天台先驱者之一的慧思起,该宗就持有强烈的末法观念。南北朝时期北方地区的长期战乱,儒、道两家多次连袂对佛教的排斥和打击,乃至通过行政手段对佛教实施的毁灭活动,使早期天台宗僧侣处于末法的阴影之中。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的建立殊属不易,而在此之后不久,其他佛教宗派在帝王的支持下,逐一相继出现,并迅速形成与天台佛教的竞争局面。也就是说,天台佛教在其成长过程中,始终面临着严峻的现实环境的考验。宋代以后天台佛教对念佛和忏悔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末法的思路,并把对消除末法的影响贯彻到最基本的信仰之中。

第四,佛教的中国化源于印度佛教传入之初,南北朝学派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化的初步实现,至隋唐宗派佛教的形成,佛教中国化已取得卓著成效,实际也已暂时告一段落。天台宗是隋唐佛教宗派中最早形成的派别,也是中国化程度十分突出的派别。它的中国化曾给予禅宗的成立以多方面的深刻影响。

天台宗之所以取得中国化的重大成就,是因为它具有广泛的思想文化的融合能力。天台宗学说中的“性具善恶”理论是它与儒学协调的产

物。智顗曾准确无误地认识到,儒家和佛教在很多领域有着共同点,其中心性理论是核心部分。他通过对两家心性理论的融合贯通,大谈人性的善恶本具,并以修习善恶来解释人的各种社会表现。智顗以后的所有天台学者,普遍继承这一传统,将儒家心性理论纳入佛家考察范围。

在道家(教)化方面,由于天台宗长期在南方传播,无疑受到南方道教思想和修行的影响。智顗栖隐的天台山,佛道共存,源远流长,以致引起他求觅仙迹,以仙道助成佛道的兴趣。宋代杭州地区也是道家文化和道教思想兴盛之地,天台宗学者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加速对道教的吸收,如道教的仪式轨范、鬼神崇拜都曾为天台佛教的世俗化、民间化予以深刻影响。

第五,天台宗既受末法观念的支配,又遭其他宗派佛教的排斥打击,所以它的宗派意识表现得比较强烈。

天台宗的宗派意识,首先表现在十分严密的判教方面。从智顗起,天台宗始终维护自宗圆教的优越感,坚持所依《法华经》的特殊地位。智顗之后,天台传人对判教倍感兴趣,不断予以丰富、强化。在这个过程中,天台宗获得了其他各宗的尊重,《法华经》也获得了非同寻常的地位。

与其他各宗相似,天台宗的宗派意识,也表现在地域性方面。智顗创立天台宗之前,曾得益于陈朝帝王和贵族官僚的全力支持,在金陵地区确立以他为核心的庞大居士集团,随后,又受隋朝官僚群体的拥护,在浙江天台和湖北荆州建立起天台宗的基本道场。天台宗后来的发展,即以这两个地区为中心得以实现,从而形成天台宗的基本地域范围。

金陵传教和天台立宗是智顗王朝正统观念的集中体现。末法意识使天台先驱者慧思的形迹反复南移,最后归老于南岳衡山。智顗受慧思之嘱,入金陵弘法,以辅助南方正统王朝。宋代天台宗除了在天台的传承,还将宗派地域扩展到当时的京城杭州以及明州(宁波)等地。宋代杭州地区佛教的繁荣发展,与天台宗势力在该地区的扩张有很大关系。

天台宗的强烈宗派意识还反映在该宗内部,其突出表现是宋代开始